

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

王汎森

五四運動與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一樣，在事發當時，人們並不認為它必然是一個重大的思想運動。事實上，當時人們提到「五四」，往往把它當作一個學生愛國運動，而很少提到它的思想層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人們並不認為它必然成為一個轉動歷史的大事。幾乎所有的回憶文字在提到「五四」時，都是生氣勃勃、勢頭極大，但是事實上它最初只有很少數的支持者。傅斯年回憶說，當時的支持者是非常少的^①。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則是這樣說的：「當時同學中尊重孔子學說、反對白話文的還佔多數。無條件贊成新思潮、徹底擁護白話文者雖佔少數，但他們具有蓬蓬勃勃的熱烈精神。」^②

一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周作人回憶說：「中華民國也居然立住」^③，足見人們並不認為革命必然會成功。同樣的，時人也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批沒有學問的人乍起乍落的「遊戲」。《草堂之靈》的作者楊鈞在〈論新文化〉的條目下便說，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很快就會灰飛煙滅，他認為這是一群懶惰學子，用十金「購東偷西抹之淺說」，不到一年時間，「為俚詞穢語之搜求，登之報端，自命作者」。又認為這種東西不可能持久，「凡無益之事，斷無永久能存之理。數年之後，人必厭之，即可冀其消滅也」。他說：「提倡新文化者，亦可廢然返矣。」^④從《草堂之靈》的編排，看不出〈論新文化〉這一條確切成於何時，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楊鈞的話全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存留了下來，而且影響了中國百年來的命運^⑤。

我想將「五四」比喻成席捲時代的「天上大風」，但「風」未必吹拂到所有的角落^⑥。事實上，歷史上也很少有思想運動真正影響到每一個地方，但經此一震盪，一旦核心內容形成，價值層級確立，它就一直像「風」一般來回吹盪着，不停地發揮着各種影響。

討論「五四」，有的從類似擁護者的角度繼續闡發民主與科學等等之深刻意涵，也有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對它之所以成為一個縱深極大的思想運動進行討論。這個事件可以化約成幾個很簡單的口號，譬如「白話文」、「民主」、「科學」，或單純的愛國運動，但也可以極度複雜——這裏面有許多繁複的層

次與意涵，而且各種思潮像捲麻花一樣在某個時期中捲在一起，成為一個複合體，可是後來又在某一個時間點鬆開了，如此周而復始。

檢視五四當事人的回憶文字，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至少有兩個層面同時在流行着。陳友生回憶道：「有公開流行者，如《新青年》、《每週評論》是；秘密流行者，如《自由錄》、《民聲》、《進化》等雜誌是。」所以學生受到的刺激也是多層次的，「前者重在批評中國的朽腐制度，及衰舊的文化；後者重在鏟除人類的桎梏，及改造社會的生活，並且公開的文字之刺激性弱，秘密的文字之刺激性強」^⑦。在政治思想方面，與前面所說的一樣，葉青強調當時有不同的層次同時並存且競逐着：「在反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的聲中，隱隱約約地夾雜着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因此國民革命自來就帶着社會主義性，包有兩種可能。」^⑧

對於「五四」這一道豐盛的習題，可以當作一個事件來處理，也可以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的，是一個長達十年以上，思想、文化或知識的革新運動^⑨；可以研究一些里程碑式的文獻及人物，但也可以立體地、縱深地加以探討。我們可以關注個別的核心觀念（尤其是「民主」與「科學」），但也可以試着把握整個「語意領域」（semantic field）的「概念叢聚」的作用。既然是一套語言或概念，它們隨時可以跨界影響，不只是思想、文化的，也可以用來想像、評估政治、生活等各種方面。我們可以用一些嚴格的定義，審視哪些人才算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人物，但是這樣一個具有宏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是「真信者」（true believer）與「半信者」（這裏的「半」是約略之詞，包含各種光譜濃淡之別）共同參與的；而且，「半信者」的數目恐怕要遠遠超過「真信者」。但是，歷來有關「五四」的討論多半着重在「真信者」，而對可能佔更大多數的參與者（「半信者」）卻所知甚少。事實上，思想運動與政治運動有些相似之處，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是「真信者」與「半信者」合奏而成的樂章，特別是在情勢底定之後，從各個角落出現的「半信者」實際掌握的影響力每每超過最初的那些「真信者」。

在「五四」擴大戰果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半信者」形塑了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模糊而無法以清楚的判教式語言說出的「五四」或五四人物的掌握，是了解「五四」如何在廣泛參與並逐步擴大實際影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實上，如果從歷史參與者的角度看，這些履歷不清的追隨者，往往才是歷史中重大運動的最大多數參與者。在思想運動的過程中，這些人的曖昧性、不確定性不定向漂移、處於灰色地帶，甚至是有技巧地運用沉默的態度，或是由各路而來、混雜在一起的情況，正是一個重大的思想、政治、社會運動中常見的現象。在這個模糊、變化，時時會給人投機之感的過程中，常常有意想不到的背離或新創。

一 “Confused period”與五四運動

為了掌握重大變化過程中複雜而模糊的現象，我想試着用“confused period”（模糊階段）來理解像「五四」這樣巨大的歷史運動^⑩。“Confused period”包含

的內容甚為複雜，稍後會有進一步的討論。此處先從在“confused period”中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說起，即在鉅變的過程中每每呈現兩條線索相互交織的情形。

晚清以來，許多重大的政治、思想變動，基本上都可以想像成“confused period”。從戊戌維新前後的諸多文字中，可以看出一種特殊現象，即在「新思潮」如颶風般吹盪之下，大致會出現兩條線索：第一條是轉動時代軸心的新思想推動者，以及許許多多受到他們影響的「真信者」；另一條線索是在模糊、頓挫不定的過程中，因各種原因而皈依的各類「半信者」，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許多非線性、非目的性的、模糊的力量移轉。如果我們的眼光只局限於「真信者」，則對歷史實際發展的認識會有所缺陷。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並不真的喜歡當「真信者」；事實上，只要願意使用「維新」的語言表示靠攏，藉由演示某些帶有新派的符號，並得到一種可識認的標籤、承認或賞識，也就足夠了。

為了減少枝蔓，我僅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描述的「維新者」為例。阿英在書中廣泛地描述晚清小說，其中最常出現的是靠着「假維新」一步一步向上的投機者。阿英提到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描述，謀不到官職的人總要「借興學以納交官場」，因為辦學校在當時是最時髦的。他也說當時的小說時常諷刺那些假「維新」之名，謀自己升官發財的人物。政府需要的也不一定是「真維新」的人，而是「半信者」，「庶不致真的維新起來，以危害自己統治」^①。當然也有許多投機份子，是藉「維新」這個各種實際利害競逐的共同語言平台（甚至「工具箱」）來做欺騙的事。如當時一般商人在「振興工商業」的美名下，幹一些騙人的事；蘧園《負曝閒談》中也有許多以「維新」的名義買空、賣空的人物^②。但是從結果來看，這些人其實幫忙把「維新」的氣勢炒熱、炒火，這也是歷史上凡遇重大政治、意識形態變動時常見的現象。

我之所以未用“transition”、“transformation”等詞，而是大膽使用“confused period”來指稱這種思想、政治等大變動的時期，是因為包括“transition”、“transformation”在內的概念，往往代表的是一組階段變化的觀念，通常也蘊含着兩個清楚的穩定狀態（steady state），而在它們「之間」的是過渡的變化。這個過渡的變化本身是線性的，而且隱然是一個有目的的運動，筆下寫來或是覺得時局中人隱然知道「未來」是甚麼，只是「看起來」未產生結果。事實上，身在事件中間的人，其內心狀態非常不穩定，過程充滿了contingency與accident。而歷史研究中之所以過度拘執於對從一個清楚的端點到另一個端點的敘述，每每是史家選出有興趣的點作為敘述對象所產生的。

我認為“confused period”並不一定沒有一個大致的發展方向，但它經常在模模糊糊的狀態中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當強而有力的銳鋒出現時，不管是思潮的、政治的或其他的物理力量，它會形成一股模模糊糊的方向感，使得局面如潮流般被推向某個方向，或可稱之為「A線索」；同時包含着另一條（或多條，此處乃約略言之）線索，即其他模模糊糊的脈絡，或可稱之為「B線索」，這個部分下文還會比較詳細地談到。而且如某一方向大致穩住，舊的

脈絡已經喪失吸引力，即使中途反反覆覆，有莫大的力量介入，仍可以維持着大致的走向，如清帝國被推翻之後的張勳復辟，當時北洋軍閥中真正跟隨張勳的人便相對有限，顯得提不起勁來，甚至公開批評他是「逆世界進化之潮流」^⑬。

我認為，歷史變化不只發生在兩極的純粹狀態，不一定是只在「守舊」與「新潮」之間，而應該只是將這一狀態視為暫時的、瞬間即逝的、過眼雲煙的，或只是為了邁向下一個新的穩定狀態的墊腳石，故只在與下一個目的性的階段有關的時候，才会有記述的意義，並將之加以觀察、凝視，正面對待。這一眼光的轉換有其重要性，因為我們要處理的是在去留未定、曖昧不明之時所產生的混亂知識，在這個未定的、混亂的階段，知識與權力的分布狀態，知識與感知的分布非常複雜，而這個狀態不因其混亂而沒有意義，它可能影響到下一個階段^⑭；不一定是目的論式的、定向的，有許多臨時起意的、前途未定的摸索，有些曾經發生影響，而後來瞬間隱而不見，以致人們從後面回頭建立歷史脈絡時，完全忽略其實際因果關係。“Confused period”是一個新舊標準、事物混在一起，曖昧不明的階段。舊概念失去意義，新觀念迅速流行，無時不在地重構，是一個軌迹不定的運動。

前面提到，在“confused period”中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新興起的、強大的、颶風般的論述，另一種是模糊、頓挫、懸疑的狀態；在“confused period”中，人們常為了給自己安排一個有利的位置，不停地在新的論述下作各種調整，包括設法獲得「雙重保險」，找到一個突然轉變立場的機會，或是透過點滴的安排做複雜的適應，或是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立場，方便與各種新、舊勢力接頭，或是在新、舊兩個標準之間循環取利^⑮。

二 五四思潮的「非線性擴散」

如果以“confused period”的概念去把握「五四」，則過程中的複雜性便較不易被忽略。一方面是如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這一批「真信者」在轉動時代、不容反對者有任何辯駁餘地地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方面，有一條隱含的、模糊的脈絡，以難以名狀的形形色色的方式在集結動員、回應，並成為這個歷史大流的一部分。在這個“confused period”中有許多容易被忽略的現象，譬如：思潮的「非線性擴散」、在新思潮運動下轉變態度的「說辭」，以及各種不同層次的文化線索與新文化運動的匯流。為了說明上述的情形，我將以三種現象來說明，它們分別是思潮的「非線性擴散」（包括「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過渡時代」的說辭、「合兩個人格為一個」式的匯流。

首先是思潮的「非線性擴散」，當歷史進入這樣一個「心靈轉變的關鍵時代」，則產生了思想擴散的毛細管作用，雖然有許多地方遠遠為新思潮勢力所不及，但它沁入許多角落的情形也往往難以想像。思想的毛細管作用至少以三種方式出現：

第一，如同艾略特(T. S. Eliot)在〈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所說的：「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系。由於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之後，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麼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儘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於是每件藝術品和整個體系之間的關係、比例、價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調整。」^⑩這是一種非直接影響而連動式的改變。

第二，產生影響的，除了個別文本或個別概念之外，也有可能是以多個文本、概念形成一個個「網絡」的方式產生影響；當然也有可能如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說的，該觀念周圍會形成“semantic field”(語意領域)，並以「網絡」或「叢聚」的方式產生作用。譬如，當極少或幾乎沒有人真正讀過任何有關「民主」、「科學」的文字時，圍繞着「民主」、「科學」，前後左右，各種相近、相反、相對照、衍生而出，或因望文生義、或因誤會而產生的種種思想概念叢聚。以下是我隨機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及《五四時期的社團》中選取的三組「概念叢聚」^⑪：

- A：覺悟、進化、無窮、世界、無政府主義。
- B：平民、平等、自由、人生、戀愛、學理、留學、人道主義、道德、智識、組織、非政治、無意識、是否合於「現代進化」、「人」的生活、問題、社交公開、不應受環境的支配，應支配環境、科學、文化、實業、為真理而真理、點滴改造文化運動、思想革命、專門學者的培養、人生觀、世界觀、世界問題。
- C：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思想、貧困、階級、社會革命、改革惡社會、工人同智識階級合作、釋放全人類、「造一種新生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共同生活」、真理進化、向上進化、向上、「血」洗出一個新紀元(俄國)、不可抗拒的世界革命潮流。

這三組概念並未窮盡當時的流行，我的分類也是極粗略的，看來第一組與無政府主義有關，第二組是新文化運動主流派的主張，第三組則是新文化運動左翼的觀念。如果把當時刊物、小說中，那些青年認為正面的、模模糊糊地屬於「新文化」的形形色色的概念抄摘在這裏，則可見「新事物」如水之赴壑而走到一起，且隨時重組或分道揚鑣。

第三，是「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五四」這一個颶風，使得人們歷經一度或多次的震盪與盤整。人們不一定要直接接觸它，也可能受其震波之影響，或是被逼着要對它所提出的重大議題有所回應——不管是吸納、重塑自己或是反對——才能再安然存立。這一道道習題包括許多方面，但以政治與文化兩方面最為重要。以政治來說，當時甚囂塵上的是「愛國」及「內除國賊，外爭強權」的口號，那麼各方面的人都要自問自答，在這一習題之下「我」要如何通過測試。譬如教會、教會學校等與西方「帝國主義」有所交涉的，便每

每要反躬自問，在五四愛國主義之下，是不是需要調整某些教義、規章或立場。文化方面，像批判傳統、個人解放、戀愛、婚姻自由，除非別過頭去不予理睬，否則即使是原先教《禮記·內則》的女學，也要問一問自己所教授的〈內則〉如何回應「五四」的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家庭解放，是略作調整，還是悍然不顧，或是重新論述一番？這方面的例子最多，它們像思想的毛細管作用，在各個角落中，那些模糊的、如調色盤中漂來漂去的色塊，不斷流動、混溶，隨時挪移身軀，形成各種適應新論述的姿態。

連五四諸人早年所崇仰的思想先驅，在「五四」鑼鼓喧天的勢力下，也不能不有所回應。「五四」是後來者，但後來者卻要左右前驅者，他們墊高了標準，使得前驅者亦不得不有所回應，才能安穩地再坐下。梁啟超即是一個例子。五四人物早年每每受到梁氏的影響，可是當「五四」如日中天時，梁氏也受其震盪而回頭盤整自己。在1902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梁氏大為欽佩西方，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不絕於言；而在歐遊回來後，他宣稱科學破產，要重估東方文明之價值，故他寫於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已不再強調西方、科學、達爾文、斯賓塞。但因「五四」提倡「民主」與「科學」，故使得梁啟超不得不產生了一種自我矛盾性：一方面宣稱歐洲文明破產，一方面也稱讚「五四」揭櫫的民主與科學。這反映在他的若干著作中經常出現一種「問答結構」，通常是自問自答，問的部分是「五四」所提出的題目。譬如《儒家哲學》中說：「為甚麼要研究儒家道術？……儒家與科學，不特兩不相背，而且異常接近。」^⑩這一問一答之間，大幅地改變了他的許多學術論述。

「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激出省思，迫使人們檢點自己，多少要了解一下，才決定是接受它或繞過去，或是一方面吸納，另一方面也進行反對。譬如蔣介石即在五四時期急切地閱讀《新青年》、《新潮》，藉以揣摩風氣，但又焦急地盤整傳統思想，亟圖重塑自己的文化主張。

當時遠在陝西的軍人胡景翼，在1918至1920年間被陝西督軍陳樹藩軟禁，讀各式各樣的書，但是慢慢地有一個主調出現了——宋明理學的心性學說，尤其是其同鄉前輩李二曲的學問。李二曲吸收、發揮陽明心學，形成一套意在引導世俗人心的心性修養之學^⑪。晚清以來的政治人物經常以心性之學或某種儒家形式的學說，加上現代科學，形成以「新知識包舊道德」(唐文治語)的思想格局^⑫。1920年3月，胡景翼受了時代的激盪，開始轉而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花了十九、二十天，終於讀完。其中有一次，陳樹藩見他手持《中國哲學史大綱》，便問他：「哲學何講，是何定義。」^⑬從他們一問一答之間，可以看出人們渴望知道新文化人物究竟在做甚麼，同時也可以看出許多人對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的、哲學的」主張莫名所以。可惜未見到胡景翼對該書的進一步發揮。但是這個例子顯示，即使是一個遠在陝西的軍人，也受到時代的激盪，渴望了解新文化運動究竟在關心些甚麼。

「銅山崩而洛鐘應」的另一種方式是激出「反命題」。即使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也不再安然作一個「無意識的頑固者」，不管贊成、反對的都覺得要對此

強力震盪出的問題作一個回答，而且四面八方，連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有人在答這份考題。以1922年一份很少人注意到的《法華鄉志·序》為例，修這部鄉志的人為他們的工作賦予了對五四以來的思維「辯論」的任務：「歷觀往史，未有敦崇禮教而國不治，蔑棄禮教而國不亂者也。邇者，卮言日肆，禮教日衰，人人知有權利而不知有道德，營營擾擾，不奪不饜，甚至非孝之說起於家庭，構兵之禍擾及全國，世變之亟蔑以加矣。」²²而對此書以「獨行」列於「名臣」、「文苑」條目之前，我認為是用心良苦，特意突出「獨行」是為了以一批不隨時代狂潮起舞的人作為鄉黨的楷模，藉以挽回禮教於狂瀾中。

新派在動員，舊派也在以他們的主張和方法動員；新派一直在變，舊派也不停地在變。當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往往視「變法—辛亥—五四」為一整體，是傳統淪喪的「連環劇」，所以我在這裏所引用的材料，基本上也不只局限於五四時期對這齣「連環劇」的回應。他們重新編織傳統，用舊的纖維一層一層地編織着、覆蓋着自己所樹立的價值，其覆蓋的方式及內容，與新派挑戰傳統的方式與內容當然有微妙的關係。而且他們熱切地動員、聚合人際關係，與其他持相近文化態度者形成「齊旋」的「風」。

從《曹元弼友朋書札》中來往書信的名單及信中的口氣，可以看出一個當時比較活躍的、與新派對抗的、由保守主義者所形成的、排他性相當高的緊密網絡，而且其中成員經常微妙地改變自己，以突顯自己作為新派對抗者的特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出的解方，基本上是「忠孝相勉」，認為「變法—辛亥—五四」整齣「連環劇」的性質不是「啟蒙」而是「作亂」。他們從儒家經典看到應時的藥方，不停地箋、註²³。他們在經書的架構下，不斷地發揮、闡釋，藉此來表達他們的寄託，譬如極為綿密地討論《孝經》、袁輯《孝經》鄭註²⁴。

在此還要特別提出的是保守派大多不掌握有力量的傳播媒體，所以每每轉向以許許多多的象徵性行動表達自己，包括祭拜明朝諫臣楊繼盛以紀念庚子死節之臣、分寄祭拜清東陵的祭品或清朝帝陵的泥土等。此外，建顧貞孝祠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舉動：顧貞孝是顧炎武的嗣母王氏，她在明清易代時殉節自殺，並遺命顧炎武不得出仕新朝²⁵。梁鼎芬、唐文治、曹元弼、張錫恭、孫德謙、張爾田等人在崑山建立這個祠，它的建立本身便是以表彰過去為人們所忽略的節烈，不仕新朝（中華民國），作為對抗新思潮的象徵性行動。

三 「過渡時代」說辭與「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現象

前面提到“confused period”中有種種進行轉軌易轍的「說辭」，其中「過渡時代」是一個經常用來說服自己或別人突然轉變、接受新思潮或新事物時很常用的說辭。晚清以來，受到梁啟超〈過渡時代論〉一文的影響，「過渡時代」成為一個時髦而有力的概念。梁氏在文中區分「停頓時代」與「過渡時代」，前者

是「膨脹力之現象」，後者是「發生力之現象」，而「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⑧。梁氏強調「過渡時代」的價值：「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台。」^⑨晚清以來，人們的口頭禪中經常出現「過渡時代」一詞，認為當時是一個「過渡時代」，這個時代以一種半自願或非自願的方式來使人適應新的潮流、作相應的改變。

通常在援引「過渡時代」作為「變」的根據時，人們口氣中每每顯露出一種「半肯半不肯」的樣子，但既然新時代的要求是邁向新的、好的、有希望的社會，所以「我」不必有任何心理掙扎，只要跟着「變」就好。如在晚清以來的多次大變中（包括剪辮髮），詹鳴鐸都以「過渡時代」作為理由，說服自己接受新潮流，好像只要有這個理由，就不必再多想了^⑩。「五四」也是這一個「過渡時代」連續體中之一環，所以「過渡時代」也常被援引作為合理化改變立場的根據，不必執守立場，不必從理想出發、過度苛求。譬如胡景翼提到有人告訴他：「當今過渡時代，自相斬伐，何必執一！誰為誰死乎！」^⑪「此次總統為徐菊人〔世昌〕，乃此次非法議會選得，蓋亦過渡人才。」^⑫在「過渡時代」這一塊招牌之下，藏納了許多新舊雜陳、半新不舊、既新又舊的成份。

在這裏我要以小說家張恨水為例子，說明在“confused period”中，經常出現的所謂「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小說帶有虛構性，但帶有時事性質的小說也不能離現實太遠，否則一眼便被戳穿了。張恨水在早年幾部膾炙人口的小說中，竭力描寫各方面的社會實態，這是一般讀者所喜歡的，但不一定符合「新青年」的胃口：有理想的青年要看到的不是這種現實，在這一條路上寫得再好，對他們也不具吸引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學扮演重大的思想啟蒙作用，牟潤孫在〈中國現代青年轉變之由來〉中說：「於是舊體裁的小說，文言的小說，青年人都不要看了」，青年人要的是活的新文學，「借着這些文學作品，新思想已然成為一股很大的潮流」^⑬。當時的文學創作中，即使寫的是現實的問題，也包括「現在的事實」與「未來的事實」，要無端地寫「未來」、寫「理想」，或寄託某種新的「理想」。這些文學作品往往形成了兩層時間，「過去」與「未來」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時間感縮短，形成一種命令式的、希望在最短時間即可達成的理想的氣氛。

許多作家為了對上述那個新的主旋律進行一種「複雜之適應」，便有千奇百態之表現。人的意識有許多層面，有其原有的層次，也另有新起的強勢論述。在強勢論述之下，原有的思想層面遇到外面覆蓋性的、震盪性的力量，以及不可名狀的新的「真理」，在為難、狼狽、慌張之下，兩條線索便可能進行無聲的對話。在此我要舉張恨水在五四之後的變化為例，說明為了「預流」、「趕得上時代」，兩個層面或兩條線索交織成為「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

張恨水原是才子佳人小說的健筆，五四後到了北平，日日在新文化運動的震盪下，遂有一種不自主的改變。他自省說：「不過在新文化運動勃興之時，這種〔對詞類〕駭骨的迷戀，實在是不值得。於是我又轉了個方向去消磨工餘時間，進了商務印書館的英文補習學校。」³⁵張恨水的心態背後是極大的驅動力——「至少我是個不肯和時代思潮脫節的人」。他反省說，「《春明外史》主幹人物，依然帶着我少年時代的才子佳人習氣，少有革命精神（有也很薄弱）」³⁶；《金粉世家》「就全文命意說，我知道沒有對舊家庭採取革命的手腕。在冷清秋身上，雖可以找到一些奮鬥精神之處，並不夠熱烈」。這兩部都是張氏早期（1920年代）最為膾炙人口的小說，但在新文化運動的震盪下，他深感「二」而不能「一」的困境，在小說中兩種人生的境界：「敘述人生」與「幻想人生」始終扯拉着，「於是那裏面的教育性，只是一些事情的勸說，而未能給書中人一條奮鬥的出路」³⁷。

所以當時文學創作面對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小說文字是要「敘述人生」還是要「幻想人生」？要寫實際尚不存在的「奮鬥人生」，成為一個進入點。是「現在」還是「未來」，是「敘述」還是「幻想」，是張恨水內心緊張之源：「假使我當年在書裏多寫點奮鬥有為的情節，不是給女士們也有些幫助嗎？」³⁸而只要自覺到在這兩者之間拉扯，書寫的內容便會不自覺地向新文化靠近。小說能否「趕上」時代，是否能「不被時代拋得太遠」³⁹，這是在這種時代焦急渴望的眼神中常見的緊張。他在《斯人記》中「以兩個不能追隨時代的男女為主角」，兩人因思想「不能徹底」，陷於「苦悶」中，小說也以「苦悶」結束；對於有人在《論語》雜誌挖苦自己，張恨水覺得「他們並不比我前進着多少」⁴⁰。

在關鍵時刻，新名詞或新概念每每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它們就像火車的「轉轍器」。而「轉轍器」運轉的根據，是「這是一個『過渡時代』」，必須向着這些新概念、新名詞所引導的方向行駛，才是合格的「過渡時代」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張恨水的《過渡時代》一書，最後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學生運動領袖閔不古順利娶到模特兒，而他衛道的父親也順利地娶了模特兒的母親。當一切違反了原有的生活邏輯，卻以大喜劇收尾時，為了合理化這些混亂的新世相，小說中居然由他們家鄉的長老召集會館同鄉，半正式地宣布，既然這是一個「過渡時代」，則這一切看來混亂至極的事，都是合理的發展⁴¹。

張恨水指出，到了1930年代，「主義」甚囂塵上，「到我寫《啼笑姻緣》時，我就有了寫小說必須趕上時代的想法」、「我的所謂趕上時代，只不過我覺得應該反映時代和寫人民就是了」⁴²。「趕上時代」、「反映時代」、「寫人民」，這是1930年代的「戲碼」。譬如晚清末年，當革命派的黃帝信仰漫天而來時，滿州貴族盛昱詩云：「起我黃帝胄，驅彼白種賤。大破旗漢界，謀生皆任便」，詩中說黃帝也是滿人祖先，但同時微妙地表達無奈，以及對自己種族命運的深切感傷⁴³。總結前述，用張恨水的話說，這是「兩個人格之溶化」，即「革命青年」加上「才子佳人」。

「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在許多地方出現。譬如在鄉鎮層次，也出現用各種複雜的對應法，吸納了一些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詞，並化合在人們

原來的東西，將之合二為一。浙江江山地方的凌榮寶（獨見）響應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家鄉辦了《獨見》雜誌，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提倡「人」，真正的好戲是讓「人們走做『人』的路，到大同的世界去！」⁴⁰他一方面提倡白話文，但同時又要略異於胡適等新人物，譬如他既受胡適《國語文學史》的影響，又要與他有所區別；對於施存統的「非孝」主張，他雖然同情，卻又要提倡「廣義的孝」批評之。在當時，像漳州之《國民》，廣州之《民國》、《新勝半月刊》也都與《獨見》的作風相近。

丁曉先在〈新時代的危機〉一文中，便觀察當時的地方青年藉「新思潮」由鄉村走上全國舞台的現象：「藉新思潮做出人頭地的階梯，借新潮做自己地位的護符。」⁴¹而各地文人為了「趕時髦」不斷轉換自己身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如1926年胡懷琛發表《詩歌叢稿》，幾年前他還在諷罵胡適的白話詩，但在此時出版新詩集，又將胡適的白話詩「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鄭重印在書前，以示與胡適的關係親密⁴²。

四 小結

本文主要是提出“confused period”這個架構來思考包括「五四」在內的重大的思想變動。在這個架構之下，形成兩條思考的線索：第一條是比較線性的、目的論式的，在兩個穩定點之間方向性的發展；另一條線索則是形形色色的、模糊的、頓挫不定的力量移轉，許多「半信者」藉此加入成為大合奏的一員。

但是本文所考慮的不只是上述兩條線索的存在，同時也想探索發生在這兩條線索之間的若干面相。本文舉了三種現象為例作為說明，它們包括思潮的「非線性擴散」（尤其是「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以「過渡時代」作為加入新潮流的說辭，以及「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不管是以哪一種方式加入「五四」這個大合奏，它們都是組成「五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魯迅在1930年代於一篇名為〈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的文章說⁴³：

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團體，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

此處，我不擬仔細追索魯迅這段話的背景，只是想拿它來說明五四新文化運動調動一切資源的實況。在「新文化」的引導下，不管每個人最初的動機是甚麼，但最終所發的子彈可以致共同敵人於死命。這恐怕是五四歷史發展中複

雜而又一致的實況⁴⁴。他們一方面「合兩個人格為一個」，一方面藉此取得一個標籤，使自己成為地方上新派的菁英，並與舊的勢力作區分。各式各樣的「合二為一」，未必是變節或墮落，它們也可能是新的風格與創造，是「五四」擴張其勢力以構成一部大合奏的組成部分。

五 補記

為了使得「過渡時代」的情況可以有一比較詳細的說明，此處要以張恨水在1932至1934年之間所寫的《過渡時代》為例。《過渡時代》雖是小說，卻反映了兩層現實，一方面反映作品中如果不穿插新名詞、新觀念，這樣的小說是沒人要讀的；另一方面《過渡時代》也是對五四青年生活現實的曲折寫照。

書中有許多場景在描寫一種情境，新的名詞、概念可以用來改變原有的行為方式，譬如「同志」的概念：「『密斯趙，我們是同志呀。』大妞在學校裏混了這多天，也知道甚麼叫同志了。」⁴⁵譬如平等，「凡是一個人，都應該平等，誰也不比誰高一點兒」，男女之間也說：「咱們只有做起一對兒來，才算是平等。」⁴⁶又譬如男女平等：「現在男女平等，男的可以想法子來騙女人，女子自然也就可以想法子去騙男人。你只要騙到他們一百二百的，我們有了盤纏就可以遠走高飛。」⁴⁷譬如貧窮的女模特兒向男友敲詐要錢，也可以解釋為她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合理化她以肉體騙錢的行為⁴⁸。又如碰到有利可圖時，宣稱「我們都是勞工」⁴⁹。這些名詞、概念逐步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標準與運作的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新思潮、新青年、新學生（尤其是學生領袖），本身即帶有可觀的權威，迫使人們在它們/他們面前低頭。學生成為一種新的身份，學生領袖有其威風，這個身份可以鼓動、提掇新事物、新流行，故學校老師要刻意聯絡、連結學生領袖⁵⁰。

後來，「無產階級者」也成為一種了不得的身份，只要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者」，即刻居於道德制高點。《過渡時代》中有一描寫閔不古與他人爭奪女友的場合，閔不古便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以顯示自己的正當性⁵¹。而且，當時閔不古等人動輒要宣稱「集合民眾的力量」，當人們要抗衡有錢、有閒的人時，就要搬出這一套說辭。如閔不古說：「你要懂得這個，你也就不至於受資產階級的壓迫了。」⁵²他宣稱，「這個時代，無論做甚麼事，都離不開物質來講話，就是社會上一切的一切，都要以經濟來做背景」⁵³，「唯物主義」也成為用來攻擊「舊道德」的利器⁵⁴。

小說裏一方面刻畫守舊人物閔不古的父親，整天詩云子曰，嚴氣正性；每道一事，腦海中所背誦相關經文即刻浮現，與現實的情境形成對照，並據以批評現實，尤其是被他視為有違倫常的世相，包括對新式學校及其學生的疑懼與敵視。但是在這以經書涵蓋世相的背後，卻每每也遮掩着他現實和醜陋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描寫新學生領袖閔不古及他的群體，或附隨在這一個

新潮流中的「半信者」或「偽信者」，以及雖不是青年，但也在試着往新潮流靠攏的人，有的是為了「趕上時代」，有的是為了在新、舊的標準間循環取利。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幾個模模糊糊的「新概念」、「新名詞」，而不見任何有系統的思想，往往是曲解或胡亂套用在這裏或那裏，扮演着現實取利的功能。可見在「過渡時代」裏，人們對於許多新事物、新概念、新名詞都沒有確切的了解，但也都曉得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新」的概念和名詞來突顯自己，顯現自己是跟得上時代的，同時獲取現實的利益。這些利益，不見得是關乎國家、群體的，有時候僅僅只是個人的。所有的事物、發展，都僅有一個大致的方向，但確切的內容卻是不定的，一切都在摸索之中，新的、舊的混雜在一起，沒有人能確定未來是甚麼。整個過程在模模糊糊、既確定又不確定中摸索前進。

註釋

①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載《傅斯年全集》，第四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155。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37。

③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8），頁182。而五四運動「居然能在歷史上立住」，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它的後來發展，一如論者在討論“eventuality”時，講到法國大革命之時群眾攻陷巴斯底監獄，在當時並不覺得那麼重要，後來則逐漸發展成一個歷史事件。參見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25-70。

④ 楊鈞：〈論新文化〉，載《草堂之靈》（長沙：嶽麓書社，1985），頁325。

⑤ 許多書以「五四」為起點，如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即是。

⑥ 正如余英時先生在回憶錄中所說，「五四」後三年，許多人或忘記，或全然不知有五四運動這回事。參見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8），頁25。

⑦ 陳友生：〈五四運動之回憶〉，載楊琥編：《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頁494。

⑧ 葉青：〈五四文化運動的檢討〉，載《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頁364。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新文化運動進行當時，無政府主義派積極支持新文化運動。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冊，頁38。

⑨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頁26。

⑩ “Confused period”是我大膽提出的一個概念。在構成這個概念時，我受到Jacques Rancière, *The Aesthetic Unconscious*, trans. Debra Keates and James Swenson (Cambridge: Polity, 2009)一書的啟發。

⑪⑫ 參見阿英：《晚清小說史》（香港：太平書局，1966），頁14、36、84；65、31。

⑬ 許指嚴：《復辟半月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1、69。

⑭ 人生「苦悶」的階段，即是一種類似“confused knowledge”的狀態。以梁漱溟為例，其子梁培恕說，當時一群人「心意一日萬變，仍無定向」、「他們所非常看重的這種苦悶。這實際上就是使釋迦牟尼出家的思想、情感」，或「他〔梁漱溟〕的苦痛是不知怎樣生活才對，而這種苦是一般人所沒有」、「於是乃大感惑而心神終日不得安寧」、「生活入於混雜不明之途」。梁培恕說其父「看重人之有無人生

苦悶」。梁漱溟人生三個階段，第一批朋友是因他的〈究元決疑論〉，而第二批是因他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三批源於19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提出民族自救運動。每一個階段都有一批人來「共學」或相助，而其契機往往是他此時發表的言論能觸動某人心中「苦悶」，而特地來走訪、共學其事。參見梁培恕：《中國最後一個大儒——記父親梁漱溟》（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頁91、90、92、93、96。

⑮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豔詩及悼亡詩」所刻畫的元稹：「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縱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參見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頁768。

⑯ T. 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in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32), 3. 中譯引自艾略特(T. S. Eliot)著，李賦寧譯：〈傳統與個人才能〉，載《艾略特文學論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頁3。

⑰ 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2）；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三聯書店，1979）。

⑱ 梁啟超：《儒家哲學》（台北：中華書局，1956），頁6、10。

⑲ 心性之學對於民國以來許多有為者而言頗有吸引力，我目前為止尚未見到考證當時心學為政治張本的著述。

⑳ 沈曾植也有相近的主張：「愚管欲以『舊道德，新知識』六字包掃一切。」參見葛兆光：〈欲以『舊道德新知識』六字包掃一切——讀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再說學術史的遺忘〉，《書城》，2008年第5期，頁5-11。

㉑㉒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章谷宜整理：《胡景翼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264、268、275；4、9。

㉓ 參見沈寶昌：〈《法華鄉志》序一〉，載王鐘原著，胡人鳳續輯：《法華鄉志》，收入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十二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頁1-2。

㉔ 尤其是「禮」書：「方今世道人心，日非一日，文武之道，將墜於地，此古聖人作《易》所不勝憂患，作《春秋》所不勝懼者。」參見曹元弼：〈致及門王欣夫大隆（十六）〉，載崔彥南整理：《曹元弼友朋書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427。

㉕ 曹元弼：〈金山吳履剛 子柔〉，載《曹元弼友朋書札》，頁13。當然，他們所註釋或發揮的經典，譬如曹元弼與張錫恭的信中提到讀羅澤南《羅山遺集》時，認為羅氏以《西銘》為基礎，發揮了一套立身處世之道：「蓋其以《西銘》為標準，而於理一中知其殊，站定腳根，硬着脊梁做去，非所謂仁以為己任者乎？」參見曹元弼：〈婁縣張錫恭 聞遠（十）〉，載《曹元弼友朋書札》，頁314。

㉖ 顧炎武在〈與葉初庵書〉中，拒絕葉氏之推薦修明史，說：「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為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參見顧炎武：〈與葉初庵書〉，載《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56。

㉗㉘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載《飲冰室文集》，第三冊（台北：中華書局，1960），頁27；27-28。

㉙ 詹鳴鐸說：「在下本清諸生，暗想與前朝作別，未免黯然銷魂，但生當過渡時代，為國民一份子，是與漢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參見詹鳴鐸著，王振忠、朱紅整理：《我之小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294。

- ⑳ 牟潤孫：〈中國現代青年轉變之由來〉，載《海遺叢稿（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49。
- ㉑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 十二 北京的初期〉，載《寫作生涯回憶錄》（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頁33。
- ㉒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 十七 關於《春明外史》（三）〉，載《寫作生涯回憶錄》，頁44-45。清儒章學誠即曾說：「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參見章學誠：〈上辛楣宮詹書〉，載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529。
- ㉓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 十八 《金粉世家》的背景〉，載《寫作生涯回憶錄》，頁47。
- ㉔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 十九 《金粉世家》的出路〉，載《寫作生涯回憶錄》，頁48。
- ㉕ 張恨水認為自己「所以不被時代拋得太遠」，是因為自己看的書很雜，還有一些長期訂閱的雜誌，這點「加油的工作」做得不錯。參見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 二十五 加油〉，載《寫作生涯回憶錄》，頁58。
- ㉖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 二十二 斯人記〉、〈寫作生涯回憶 二十七 忙的苦惱〉，載《寫作生涯回憶錄》，頁53、63。
- ㉗④⑤④⑦④⑨⑤②③ 張恨水：《過渡時代》（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頁251；83；127；125；233；132；134-35；211。
- ㉘ 張恨水：〈我的創作和生活 九 從《啼笑因緣》起決心趕上時代〉，載《寫作生涯回憶錄》，頁146。
- ㉙ 定宜莊：〈晚清時期滿族的國家認同〉，載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76-80。
- ㉚ 獨見（凌榮寶）：〈看了「英雄與美人」之後〉，《晨報副刊》，1921年12月7日，第3版，頁3。
- ㉛ 丁曉先：〈新時代的危機〉，《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月4日，第4張第1版，頁14。
- ㉜ 胡懷琛：《胡懷琛詩歌叢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 ㉝ 魯迅：〈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載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二心集》（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41），頁42-43。
- ㉞ 參見瞿駿：〈新文化運動的「下行」——以江浙地方讀書人的反應為中心〉，《思想史》，第6期（2016年3月），頁47-98。
- ㉟ 「歐化先一想，這位模特兒倒真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參見張恨水：《過渡時代》，頁55。
- ㊱ 譬如小說中提到，作為教師的胡當仁聽到閔不古的名字，就想起這「是個最出風頭的學生……在南方當學生的時候，本來知道他大名的很多，頗有令人久仰的資格」。和閔不古談話後才知道他是南方去請願的首領，報紙上曾記載過他被逮捕的事情，全國學生會都打電報到南京去救他，所以就想：「關於能出風頭的學生，教員們總是願意聯絡的。」當時想要當權威者，「必定要上有文藝界的名人提拔，下有社會上新思想的青年捧場，才可以到那個境地」；「不古笑起來了，因道：『在這個時代做一個青年，我們總要站在潮流前面。胡先生到這裏來，當然是來找些大眾的藝術。』」參見張恨水：《過渡時代》，頁128-29、134。
- ㊲ 閔不古對學生說：「忠孝仁義這都是封建時代的道德，是一種作偽的行動，由唯物的辯證法看起來，因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要造成一個有權威的人，他把他的權利思想變成一種奴隸人民主義，灌輸到社會上。」參見張恨水：《過渡時代》，頁228。